深察名号:董仲舒的文章美学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黄 若 舜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深察名号”是串联董仲舒文章美学与政治哲学的关键。他从中提炼出一种文法化入行文之中,一变西汉前中期以“事”为导向、痛陈利害式的奏议文风,其专深柔美、从容节制的“名理”之文成为之后奏议文的取法对象和美学典范。同时,作为用以研判是非顺逆的政治哲学方法论,“深察名号”关系董仲舒对于政治秩序和名教伦理的宏大思考。他以“名号”关联“天命”,将“名”理解为上天借助圣人所发出的声音与言辞,这具有鲜明的神学色彩。

关键词: 深察名号;名理;渊懿;天命

中图分类号:I 20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3-0083-10

作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思想家,董仲舒深受学界瞩目,关于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在文学研究领域,他所受到的关注却很有限。事实上董仲舒的散文有着重大的学理价值乃至文学史意义,他是秦汉散文美学的革新者,开启了奏议文的“经术”化、“义理”化潮流。学界虽多承认董文的转移风气之力,落实到文本分析的时候却始终停留在“宏博”“醇厚”“典雅”之类的概括性描述,尚未能深观其独特之处,尤未能剖析这种独特文风背后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深察名号”思想是串联董仲舒文章美学与政治哲学的关键,故力图以此为核心探讨其文章的美学特质及思想基础。

一、“入细”的“文理”

以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而论,董仲舒实为一位重要的散文家。其专深柔美、从容节制的经术之文,一洗西京早期痛陈利害式的奏议文风,确立了之后的文章美学典范。而学界少有留意的是,这种文章美学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其行文的核心文法,此一文法恰好源自董学重要的政治哲学方法论“深察名号”。

要把握这一点,宜将董文放回汉代文章史的脉络中,对比西京早期文风以彰其卓异。清人曾高度凝练地以“贾茂董醇”①一语概述西汉文章,从西京前期之“贾茂”到中后期之“董醇”,大汉文章美学在董仲舒手里发生了转变,这几乎成为学界共识。②古人同样关注到这点,如朱熹便从“文理”角度下过一个

收稿日期:2019-09-07

作者简介:黄若舜,男,福建泉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① 如汪由敦《恭进〈皇清文颖〉表》:“或薛《易》匡《诗》,每依经以著论;或董醇贾茂,因对策以建言。”罗源汉《奉命出都赋呈吴昆田同官》诗:“骈俪潘陆才,黼黻庙堂谟。董醇而贾茂,条对归通儒。” 汪由敦:《松泉文集》卷 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7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81 页。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卷 79,《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邓氏南邨草堂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总第 497 页。

② 郭预衡认为汉代文章从董仲舒开始由“纵横驰骋转变为坐而论道”,陈平原则进一步将这种转变归因于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韩兆琦、吕伯涛认为:“随着汉武帝的尊儒,随着董仲舒文章的出现,又新兴起了一种与新儒学相适应的新文风,而且在汉代百余年间,随着这种新儒学对汉代社会统治的日益加固,这种醇厚典雅的文风后来竟占据了一种压倒的优势。董仲舒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0 页。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52 页。韩兆琦、吕伯涛:《汉代散文史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4 页。

重要判断:

> (吴必大)因问:“董仲舒三策文气亦弱,与晁、贾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朱熹)曰:“仲舒为人宽缓,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汉自武帝后,文字要入细,皆与汉初不同。”①

较之西京前期散文,董文“文气”变弱,却转趋细密了,这种“入细”的特质实根源于经术。正如朱熹所指出的,“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②,体察《春秋》的微言大义需要极精细的义理工夫,仲舒议对正有取于这种精微的风格。故刘勰称“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③,浦起龙《古文眉诠》评“董学原本《春秋》,约符命以经术,贯天人于治教,粹然一出于正,方之贾生,有经术、事功之辨”④。

朱子“入细”说引示了董文深受《春秋》学影响的“义理化”特征,这种看法又源于他对文理的独到见解。⑤ 朱子认为行文应具备一种深层的“义理秩序”,他常痛感于“蕃人及武臣文字”之“不成文理”⑥,尤以贾谊为“言语无序”的典型。在他看来贾谊行文有如一匹暴躁的野马“制御他未下”⑦,逞才使气文理不通;而董仲舒的文字才是可以“从道理看”⑧的文章。据此,倘以汉代前期贾谊诸公与董生的文章作对比,不难发现前者是以“事”为中心铺陈作论的,务在借历史经验或当前的政治实事阐明利害,深染所谓“战国气”与“秦气”;后者则推本于“名”理,经由对名义的深察透析演及政教。以文风论,前者雄肆而后者节制,二者亦判然有别。

二、西汉早期的“事功”之文

公允而论,朱子从“文理”角度对汉代文章所作的分析堪称“深刻的偏见”,以贾谊为代表的西京早期文章并非全是性情驱动“胡乱写去”⑨,而是深受战国政治理性所左右的“事功之文”。与董文相比,西京早期散文重在应“事”而不在明“道”。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策论,即使义理透彻、文法高明也无甚可取。正因为这路文章不可能“离事而言理”,其相应的章法在朱子眼中势必显得“段落不分明”⑩。

古人常以“战国气”和“秦气”论西汉早期文章,而这两种文风都根源于霸政时代所特有的、功利而又冷酷的政治理性。首先说“战国气”,即纵横气。在多数人眼中,纵横修辞深具情绪感染力,似乎是一种畅快淋漓、颇见性情的文学;实际上这种政治辞令至为冷寂、最无感情,因为其仅为纯粹的修辞之“术”。章学诚便以纵横修辞为“行人辞命之极”,并认为九流之学虽归趣不一,然一旦“出而用世”,则“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⑪,暗示其为技术性言辞的极致。⑫ 缘此,观西京早期之文,不论是蒯通游说韩

---

① 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尚书一·纲领》,收入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卷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8册,第2634页。

② 《朱子语类》卷83《春秋》,第2842页。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5《议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39页。

④ 浦起龙辑:《古文眉诠》卷33,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乾隆九年三吴书院刊本,第12b页。

⑤ 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论文都极重条理,如他们看重《大学》《中庸》便与这两篇大文字层次严整有关,方孝岳指出:“《大学》《中庸》两篇,条理最为整密……宋儒把他抽出来,和《论》《孟》相并,是家喻户晓的了。”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散文概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2页。

⑥ 《朱子语类》卷116《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3673页。

⑦ 《朱子语类》卷58《孟子八》,第1871页。

⑧ 《朱子语类》卷137《战国秦汉诸子》,第4252页。

⑨ 《朱子语类》卷116《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3673页。

⑩ 《朱子语类》卷116《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3673页。

⑪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1《诗教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⑫ 参见赵逵夫:《论纵横家的历史地位与〈鬼谷子〉的思想价值》,《中州学刊》2008年第1期,第218—222页。

信背汉,侈陈天下形势,抑或是陆贾说南越王尉他,以秦楚之势反衬夸饰汉王之强盛,又或是贾山疏谏文帝,邹阳剖白梁王,从西汉早期文章口辩之士,到武帝时代的藩国文术中,纵横之“术”的运用极为广泛。此风直至汉武帝赐书庄助,命“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①方有少减。

复论“秦气”,即法家辞气。刘熙载《文概》评曰:“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②如果说纵横修辞是恢廓声势以虚张其表,法家文章则有一种表里如一的冷酷。刘师培衡鉴儒、法两家文风之异时认为:“法家之文,发泄无余,乏言外之意,说理固其所长,但古质而无渊懿之光;儒家之文说理虽不能尽,而朴厚中自有渊懿之光。”③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所谓“渊懿”恰好出于古人对仲舒经术文风的描述,明丁自申《与王九难郎中》即有“仲舒《天人三策》渊懿醇雅”之说。④“秦气”或法家文风作为“渊懿醇雅”的对立面,具有“古质”的特点,这其实早已为刘勰所指出。《文心雕龙》明言“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政无膏润,形于篇章”⑤,又说“法家辞气,体乏弘润”⑥,可谓将“秦气”刻画无遗了。冷酷的法家之文谈论的都是形势的因果利害,词锋犀利不加润色,所谓“申商刀锯以制理”⑦。这种务实到骨子里的文风有“事实”之冷峻,却缺乏“人文”的温度,故“古质而无渊懿之光”。

西京早期的主要作家,如贾谊、晁错等,无不深染战国气与秦气。如朱熹论“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⑧,其说极精。且不论《治安策》中诸多痛哭、流涕、长太息的夸诞之语,将时势喻为“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的恫吓之辞;仅其中一节诱导汉文帝安享“射猎之娱”“钟鼓之乐”⑨的同时又能顺治天下的文字,便与苏秦游说齐闵王时所吹嘘的“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之(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⑩如出一辙。而极尽铺张蓄势之能的《过秦论》更是暗合纵横捭阖之术。陈衍论《过秦》之时便点明了这种“开合擒纵”的行文技巧,所谓“纵之愈远,擒之愈见有力”⑪。可以说贾生堪称西京文章“战国气”的集大成者。

说到秦气,鲁迅论西汉散文时便特别提及《太史公自序》中的“贾生、晁错明申商”一语,可谓卓识。⑫ 贾谊、晁错善于静观形势因果终始,进而以明晰峻刻之笔揭示事态的走向。如贾谊《请封建子弟疏》,后人对此文明断时局之能极为赞叹。楼昉论曰“深识事势,议论剀切,笔力老健,至吴楚之反而说始验,至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通达国体也”⑬,王文濡则赞曰“料量后世如指诸掌,得君如文帝而不尽用其言,惜哉”⑭。而晁错计算形势更有胜过贾谊之处,司马贞即谓“朝错建策,屡陈利害,尊主

---

① 《汉书》卷 64 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90 页。

② 刘熙载:《艺概》卷 1《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1 页。

③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2 页。

④ 丁自申:《与王九难郎中》,黄宗羲编:《明文海》卷 15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5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总第 634 页。参见许结:《说“渊懿”:以西汉董、匡、刘三家奏议文为例》,《文学遗产》2008 年第 5 期,第 35 页。

⑤ 《文心雕龙注》卷 5,第 422 页。

⑥ 《文心雕龙注》卷 5,第 394 页。

⑦ 《文心雕龙注》卷 4,第 308 页。

⑧ 《朱子语类》卷 137《战国汉唐诸子》,第 4239—4240 页。

⑨ 《汉书》卷 48《贾谊传》,第 2231 页。

⑩ 刘向集录:《战国策》卷 12《齐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41—442 页。

⑪ 陈衍:《石遗室论文》,《陈石遗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60—1561 页。

⑫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5 页。

⑬ 楼昉:《崇古文诀》卷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总第 22 页。

⑭ 姚鼐辑,王文濡校注:《古文辞类纂评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81 年版,卷 12。

卑臣,家危国泰”①。观《陈术数疏》之悚切,《言兵事疏》之裁断,深见经世之才。

综括而言,霸政时代各家各派在直面杀伐决断的残酷现实之时,激发出务实功利的政治理性,西汉早期奏议文时而飞扬躁竞,时而峻刻凉薄,多不免受其影响。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章无论如何向君王“痛陈利害”,文气辞采是否激昂奋动,其面对人“事”的兴衰代谢却无一例外具备一种冷酷观审的态度,并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中把握一种不以人力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势”。这种对历史采取“自然化”认识的眼光源出“黄老道术”。刘歆《七略·诸子略》论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②史家遍观旧史,便会建立起一种超然于世的眼界,以冷酷的态度静观事态,这便是司马谈论道家所说的“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③。不难发现,贾谊、晁错这些深染“战国气”和“秦气”的政治家无不精通黄老道术,贾谊《新书》中《道术》《六术》《道德说》诸篇便体现出对黄老认识论与历史观的深刻领会。故而说到底,这种以实事利害为导向,夹杂了强烈功利气息的事功之文终究显得有些冰冷,而自董仲舒《天人三策》一出,西汉奏议逐步转向为一种温和节制、专深柔美的义理之文,这种美学转向的背后不但有着文法的支撑,更有着深刻的思想因素。

三、董生“名理”之文及其渊懿之美

合战国气、秦气而言,西京早期文章终不免于“激发暴露”“发泄无余”之讥。要之,贾谊等人的文字重在论“形势”而非说“义理”,他们将利害关系谈得过于冷酷,话也说得不加克制。而诚如朱子所论,这种精光发露的文法到了董仲舒这里明显发生了变化,仲舒以“入细”的义理工夫有效地节制了文气,其文虽然显得有些“善弱无气焰”④了,却也变得能够“从道理看”。

朱子的文章秩序说实际上是一种有着等级次第的文理观,在他看来天下所有的文章都应如《大学》《中庸》一般开宗明义,昭如日月,继而“义理明,则利害自明”⑤。细读董仲舒文章,不难发现具有高度“建筑感”的董文便合乎朱熹对文理的要求。借用其修葺破屋之喻“且如一间破屋,教自家修,须有先后缓急之序;不成一齐拆下,杂然并修”⑥,可以说董生行文绝非“杂然并修”式的,而是正合于先义理而后利害的“先后缓急之序”。

董生言而有序、层次井然的文理便得益于其“深察名号”的核心文法,他的行文几乎都是从名号的详释精析入手,进而深察名理、论及治道。要分析名理的精微之处,首先便要“正名”。《天人三策》中充斥着“……者,……也”,“……者,所以……也”,“……之谓……”这几种定义性句式,试为胪举:

>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 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
>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
> 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
>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
>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

① 《史记》卷 101《袁盎晁错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749 页。
② 《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32 页。
③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 3292 页。
④ 《朱子语类》卷 116《朱子十三》,第 3673—3674 页。
⑤ 《朱子语类》卷 139《论文上》,第 4318 页。
⑥ 《朱子语类》卷 58《孟子八》,第 1871 页。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絫久也。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①

由此可见,董文的首要特点便是“正名为先”②。“正名”之后便是“察名”,他会紧接着“深察名号”,复以察得的“名理”推演“政理”。仲舒行文善由“正名”入手层层剖析,参乎天道,达于人事,经义、政论浑化无迹。刘松来认为“在思维方式上,董仲舒的政论散文也一改汉初散文以古鉴今的线性思维模式,开始注重逻辑演绎,往往从赋予儒家经典以绝对神圣含义起步,推导出礼义教化的天然合理”③,此说即指出了仲舒行文善推理的一面。

以其《天人三策》中著名的“王道终始”一节为例对“深察名号”之法加以说明。在这段话中,仲舒首先为《春秋》“一元”正名,“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以察得的“一元”之义得出孔子作《春秋》寄寓的政理:“视大始而欲正本也。”紧接着便据“正本”推演:“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待推演至天地万物为正气所润泽,招致祥瑞,“王道终矣”,便笔锋一转,以孔子有德无位、身卑贱不能招致祥瑞,对比汉武帝贵为天子却“美祥莫至”,引出了方今政教的弊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复详述兴学立教、仁义为国的重要作用,浑沦其篇,神完气足。④

这段精彩论述备受后儒赏誉,完美体现了仲舒“深察名号”的文法。朱熹称道仲舒“入细”,便与这类由名理出发层层转进、入于深细的文字有关。陈衍细绎《三策》,进一步发现当中许多文段都有着相同的先后次第和论述结构:“第二篇首分两段,皆用‘此之谓也’。指出旁逸之分,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中隔一小段,乃言‘秦则不然’,亦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亦用‘此之谓也’作结,则照发问次第为对也。”⑤这些观察颇为敏锐,稍作归纳不难发现,《天人三策》可以说存在着固定的“行文套路”,许多文段均有“……者,……也。故……孔子曰……”的格式: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⑥

如此行文好似解经一般,先“训诂”正名,后据名理作“传”加以引申发挥,而诸多“格式”相同的文段参差比并,又如“章句”一般,“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⑦,具有如礼乐般的节度之美;而董仲舒比并章段的文法之所以“言而有序”,富于节制的美感,正缘于对章句之学节度之美的深度吸纳。

---

①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2499—2523 页。

② 凌曙:《春秋繁露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12 页。

③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上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1 页。

④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2503 页。

⑤ 《陈石遗集》,第 1568 页。

⑥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2499—2518 页。

⑦ 《文心雕龙注》卷 7《章句》,第 570 页。

仲舒由正名始、进而察名析理的行文并非仅见于三策。放眼其政治生涯,他始终重视释名章义,凡事必求正名百物、辨明然否。武帝庙祭时欲“以鹜当凫”,仲舒对曰:“鹜非凫,凫非鹜也……奈何以凫当鹜,鹜当凫? 名实不相应,以承太庙,不亦不称乎?”①可见其对名实相应的看重。江都王刘非以泄庸、文种、范蠡为粤之三仁,董仲舒以柳下惠“伐国不问仁人”的典故为“仁人”正名:“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②这句话深刻影响了后世理学家。同样在《春秋繁露》中,对于事物名号的考察辨析几乎随处可见。《繁露》全书属《仁义法》篇的察名析理最为精彩:

>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与我者,不可不察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③

此文深察仁义之名,以“安人”释“仁”,以“正我”解“义”,从而推导出政教层面的“仁法”与“义法”,行文深透、层次递进。不难见出,董仲舒解义论政所以能透彻,在于对儒学义理精纯深厚的浸润,而他所运用的文法乃至学术方法便是“深察名号”。

仲舒以此法行文,更进而使文章具备一种儒者之文专深柔美的懿范。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云“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义也,此天地之仁气也”④,此说便点出了汉代经术文风的专深柔美之度,而董文恰为“渊懿”之文的滥觞。“渊”指文章的深度。对比西汉早期文章,贾谊诸公关注的多是现实问题,而非根本问题,虽能耸动人主,却难以餍饫人心,缘其对政教原理的体悟终究有限。而作为经学大师,仲舒论政则全然从“道”“元”“性”“命”之理入手,逻辑递进地将为政之本末体用发明无遗,这种深察名号的“义理之文”显然有务实的“事功之文”无法触达的哲理深度。

“懿”则点出经术之文的柔美风致,董文深察名号之法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一儒家散文本有的优雅特质。《逸周书·谥法解》云“温柔圣善曰懿”,又曰“柔克为懿”⑤,比诸战国文风之纵横雄肆,法家文风之峭直峻刻,儒者之文本就显出温厚柔和的懿范,这种优雅之美通常体现于舒迟和缓的文气与郑重烦絮的文辞上。而比起先儒的文章,董仲舒尤喜察名推演、在义理基础上大量引申发挥的风格,竟使其文比一般儒家散文要更为舒迟。宋祁谓“仲舒优软不迫切”⑥,陈衍谓“不肯求其简捷”⑦,正意在强调董文过于常人的柔缓。《天人三策》作为汉代渊懿文风的开创性作品,当中有些文段实在太过优雅,从名理出发推理缠绕许久也没回答上武帝提出的问题。这也令求才若渴、却性情躁竞的武帝颇有些不耐烦,他心疑董子是否出于忧谗畏讥而文有拘忌,在策问中不断催促“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文采未极,岂惑虖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⑧;仲舒却好似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地阐述看似不切时务的名理,陈衍生动地说仲舒是“肯说多余话,而说来不讨厌,使人动听”⑨。细察之下,这种温柔优雅的阅读感受与深察名号的文法切切相关。

须指出的是,文气柔缓虽显出儒家散文之懿范,却也容易带来繁杂之弊。一般而言老师宿儒多说教

---

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15《郊事对》,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417 页。
②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2524 页。
③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8,第 249—250 页。
④ 曾国藩著,李章瀚、章筱泉编:《详注曾文正公文集》卷 2,见《曾文正公全集》,上海扫叶山房民国廿一年[1932]石印本,第 6b 页。
⑤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卷 6《谥法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4、752 页。
⑥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左氏百川学海》第 12 册丁集上,第 17b 页。
⑦ 《陈石遗集》,第 1567 页。
⑧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2514 页。
⑨ 《陈石遗集》,第 1567—1568 页。

而少推理,常致纲目冗杂,头绪万端,七十子后学与荀子散文的许多篇章便深中此病。而深察名号的董文却独有柔缓之度而无杂乱之感,即刘勰所概括的“烦而不慁”,因为董文全然按照义理先后的逻辑层次来组织,条理整密容易把握,这与先儒文字稍有不同。不妨认为此间区别便是由于先儒“正名”与董生“察名”的不同偏好所导致的,后者显得更逻辑化。

缓气繁辞固非十全十美,却可使文章温柔优雅,这种为深察名号之法所大为强化的懿范正是董文最直观的特点,是其雍和气度的外显。张谦宜《絸斋论文》云:“董江都《贤良》三策,其不可及正在平实端悫,无策士嚣横之习,所谓儒者气象也。”①仲舒以深察名号之法组织辞令,行文贯以纯正的义理,令其文独具专深柔美、从容节制的懿范;应该说,此种新美学便源自其深受“儒家人文理性”陶染所成的“温淳渊懿”②的“儒者气象”,这与严峻冷酷的“战国政治理性”熏习而出的“策士嚣横之习”异趋。

四、名号的神圣之源

把握到“深察名号”这一核心文法,适足以体会董仲舒是如何将此法化于行文之中,进而造就了这种专深柔美、从容节制的经术文风。值得注意的是,“深察名号”并非仅是一种“文法”,更是董仲舒精研《春秋》学之后提炼出的政治哲学方法论。可以说,董仲舒的文章美学隐含其关于政治哲学的宏大思考,而“深察名号”恰好将二者串联为一体,使之互相映射。

要透达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思想,首先要了解从儒家先贤“正名”思想直至《春秋》“正名”论的发展脉络。“名学”是春秋战国时期一股重要思潮,而儒家在这股思潮中显得有些独特,因为滥觞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并不那么纠缠于言语逻辑,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教伦理指向。孔子认为世间万物、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名”均为真理性的“义”所支配,而根据此“义”,“名”可以得正,事物与政治的秩序也得以理顺,以《左传》中的四个字来概括即“名以制义”③。

在儒家传统中,“正名”历来被视为拨乱反正的政治首务。《论语》中孔子与子路关于“正名”的对话牵涉当时卫灵公、南子、卫世子蒯聩(后庄公)、公子郢、卫出公辄等人的恩怨及卫国内乱的一段史事。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④虽然古人对卫出公拒父一事的是非判断有较大分歧,但均把握到了孔子以名正政,以义正名的意图。温公颐将孔子“正名论”放在先秦名学的脉络中加以考察,认为与重逻辑、好察辨的邓析一派不同,孔子“正名”显示出极强的“正政”取向:

>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各自有它的道德范畴,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之类。孔子即用君臣父子等道德范畴的本质,也就是以君臣父子等之名来正当时客观存在的君臣父子等之实;用概念本质的名纠正实际上的君臣父子之实,使实符合于名。这样天下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之实都能各为其所应该作的行为,自可无过不及之弊。如是人伦整饬,纲纪井然,国家至治,可计日而待。⑤

---

① 张谦宜《絸斋论文》卷5《评品》,见王水照《历代文话》第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8页。
② “温淳渊懿”一词出于二程对颜回的形容:“孟子之于道,若温淳渊懿,未有如颜子者,于圣人几矣,后世谓之亚圣,容有取焉。”又云:“颜、孟之于圣人,其知之深浅同,只是颜子尤温淳渊懿,于道得之更渊(一作深)粹,近圣人气象。率气者在志,养志者在直内。”“渊懿”恰好又是古人形容董仲舒经术文风的用词,两者可以相参。分别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卷2上和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51页。
③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桓公二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85页。
④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16《子路》,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1—522页。
⑤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此处“道德范畴的本质”用古人的话说便是“义”,这个定“义”决定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君不仁不可谓之君,臣不忠不可谓之臣,倘有君不仁、臣不忠者,即可以“仁”“忠”之义正“君”“臣”之实。《左传·成公二年》引孔子语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①,“名”背后的“义”传达出人、事、物最合宜的状态,以此调整社会生活诸偏失,这在孔子看来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不难发现,后世的孟子、荀子同样极重以义正名、以名正政,如孟子对齐宣王辨正桀纣非“君”,不过是残贼“一夫”②,荀子痛击乱名实的邓析、惠施等名家,以乱名之举“犹为符节、度量之罪”③等。很显然,正名思想及其背后的正义论事关儒家政教的根本问题。

不难发现,先儒论“名”仍限于“名—义”关系这种哲学解释,而董仲舒的名学思想则在这一基础上全然走向了神学化,他认为“名”不但关乎“正义”,更进而关联圣人所布达之“天命”。通过建立一套“名顺于天”的形上学,他赋予了名号神圣的自然基础。《深察名号》云:

>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④

古人制“名”,势必要求助强势的感觉器官,《荀子·正名》便提及“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⑤,目得其形,故有“形名”,耳闻其声,故有“声名”,故训诂最重“形训”与“声训”。《深察名号》将“名”“号”解为圣人效法天地而发出的“鸣”“謞”,类似于鸟兽的鸣叫声,显然属于以“声”制“名”。⑥对此徐复观颇有异议,认为这是“把名还原到原始社会中的咒语上去了”⑦,他的这一看法恰好揭示出“深察名号”论的神学根基。在早期社会中,人的“声音”以及由声音所传达的“言辞”具有宗教意义,巫祝谨慎地掌管着通神降神的言辞,人们也以“发声”的方式向祖先神灵昭告幽微。如《尚书·金縢》中,周公便以祝辞通灵。董仲舒正是借助了这种方式找到了名号的神圣之源。在他看来,“天”为“群物之祖”,他虽“不言”“默而无声,潜而无形”⑧,却是有意志、会布达命令的自然神灵,这种潜在的“声音”与“言辞”唯有“圣人”能谛听。通过将“名”解释为圣人经由发声的方式所传达的天命,抽象难言的“道”便寓于名号之中而变得非常具体,人们要通晓伦常大义,只需深察名号,便可知“是非”、明“逆顺”,知晓天命之去取。而被道家认为无法道说真理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承载圣人文言的“经”就变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言辞”直探“天心”。所谓“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⑨,言辞名号这套人类的表意符号系统重新承载起构塑政治秩序的使命。

缘此便不难理解《天人三策》为何察名知义后必“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只因孔子是通晓“天意”的圣人,“畏天命”必先“畏圣人之言”。孔子以《春秋》“正名”之所以能令“乱臣贼子惧”,也正源于名号的神圣性根基。《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则说道:“《春秋》慎

---

① 《春秋左传注疏》卷25《成公二年》,第4111页。
② 《孟子注疏》卷2下《梁惠王章句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28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6《正名》,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4页。
④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0,第284—285页。
⑤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6,第417页。
⑥ 参见贡华南:《从形名、声名到味名:中国古典思想“名”之演变脉络》,《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⑦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版,第226页。
⑧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4《郊语》,第397页。
⑨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5《顺命》,第411页。按:此语出《穀梁传·庄公元年》,为《顺命》篇所引用。
⑩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0下《天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7页。

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所谓“名伦等物”,苏舆注曰“因伦之贵贱而名之,因物之大小而等之,故曰名伦等物”①,意即在《春秋》这部大经大法中,孔子是以“正名”的方式安排君臣父子的人伦秩序,乃至世间一切事物的秩序。这便是《深察名号》篇中所提到的“《春秋》大元,故谨于正名”②。《太史公自序》云:“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③这段话便道出了《春秋》通过正名以判定纲常大义的笔法,人在政治生活中若不能深察名分大义,即便有好心肠也不免于动辄得咎。如著名的“赵盾弑君”“许止弑父”便属此类,二人并无弑君弑父之心,却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如此一来则《春秋》“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范仲淹《近名论》有云:“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④可以说,孔子的正名褒贬之所以能令人产生敬畏感,与一种类似面临末世审判的宗教意识相关。

在董仲舒与后世的公羊家看来,名号源于天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纪方有终极的理据,孔子便是运用“名伦等物不失其理”的笔法使“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⑤。不难见出,董仲舒的“名伦等物”说可谓尊卑永固、秩序森然,是一种有着庄严“建筑感”的等级思想。大义是非取诸名号的逆顺,顺从君臣父子的“名理”便是顺从“天命”,这便是与《深察名号》相为表里的《顺命》篇所要阐发的思想。《顺命》篇中,董仲舒以天为“万物之祖”,认为人皆受天命而生,“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而圣人孔子便在《春秋》中传达了这种天命,“《春秋》列序位尊卑之陈,累累乎可得而观也”。缘此,他以“天命”为终极依据,“类推”出了人类社会的“受命秩序”:“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凡违逆“受命秩序”者,《春秋》中都以“正名”的方式予以贬斥:

> 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卫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卫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则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⑥

在仲舒看来,名号各具其“义”,如“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⑦等,而这些名号背后的大义又是奉顺“天命”而来的。通过“深察名号”,人们便能“知命”而“尽义”,最终恪遵“名教”,安分守己地生活。故而“深察名号”作为一种判别是非顺逆、洞察人类生活伦理原则的方法论,在董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他几乎将这精研《春秋》而得出的方法论运用于一切哲学命题的辨正过程中;甚至还将其作为一种“文法”,如盐着水般融于本应高度务实、功利的策论之中,进而以义理纯正、专深柔美的新文章美学,取替了由冷酷政治理性所主导的旧文章美学,奠定了西汉中期之后“朴厚中自有渊懿之光”的经术化奏议文风。

五、余　论

依章太炎所论,文章分“名理”“事理”二途,董仲舒散文正是典型的“名理”之文。⑧借由“深察名

---

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3,第 85 页。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10《深察名号》,第 305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98 页。
④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 5,《四部丛刊初编》第 135 册,上海:上海书店 1989 年版,第 10 页。
⑤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3《精华》,第 85 页。
⑥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15《顺命》,第 410—412 页。
⑦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10《深察名号》,第 286 页。
⑧ 章炳麟:《文学略说》,《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287—288 页。

号”这一“明道”之法,仲舒得以在原本高度务实的奏议文章中发明义理,不但以专深柔美的风致一变汉初“事功之文”的嚣横雄肆,还将抽象的“道”落实为隐藏于名号之中的天命与圣言,即此而言,恒常之“道”重新变得“可道”。可以说,经术文风所以为古代文章学评价体系举为正统,与董仲舒在这方面的贡献切切相关;而这种开创之功又得益于其体系哲学的独特魅力。

董生之后,经术文风渐成大汉散文的主流,不论是动言“礼乐”的“醇儒”,抑或喜谈“灾异”的“通儒”,他们于《三策》或取其纯正,或得其开阔,无不深受董生文法及其渊懿之美的沾溉。尽管如方苞所言,董生之后奏议文变得“繁重滞涩”,不复西京早期之“生气奋动,倜傥排宕”①,但作为曾在历史上被奉为正宗、如今亦极具价值的文章美学典范,仍值得我们重新加以审视并深入体察。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Names: the Aesthetical and Political-philosophic Foundation of Dong Zhongshu's Articles

Huang Ruosh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names(深察名号) is the key principle that runs through 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Dong Zhongshu's(董仲舒) articles. He establishes a new way of writing. The previous writing style that was dominated by political nous and mainly dwelt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olicies in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s now replaced by a new writing style in techniques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at is profound and graceful, deliberate yet moderate,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the new aesthetic paradigm for writing ever since. Meanwhil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names* is essentially a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study and determine righteous causes and to observe and study ethical principles, based on which Dong Zhongshu's aesthetics of writing is formed to adequately demonstrate his grand contemplation on political order and Confucian ethical codes. Dong associates "names" with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interprets the "name" as the heavenly message through sages, which is definitely theological.

Key word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names(深察名号), Confucian ethical codes, profound and graceful, Mandate of Heaven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王水照《历代文话》第 4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52 页。